

●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多元产业结构转变 与经济发展

● ●
郁义鸿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恒忠

封面设计：朱永庆

ISBN 7-309-02414-1



9 787309 024142 >

ISBN 7-309-02414-1/F · 556

定价：15.00 元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

——一种理论框架

郁义鸿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郁义鸿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1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ISBN 7-309-02414-1

I. 多… II. 郁… III. 产业结构-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441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30 千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顾 问	蒋学模	张薰华	陈观烈
	洪文达	叶世昌	洪远朋
	尹伯成	苏东水	顾国祥

主 编 伍柏麟

副主编	华 民	张 军	刘子馨
	石 磊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磊	刘子馨	华 民
朱国宏	张 军	苏荣刚
芮明杰	张晖明	陆德明
周伟林	姜波克	袁志刚
徐惠平	黄亚钧	彭希哲
戴星翼		

总 序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并在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步步在开创着新局面。生产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和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但是,这些成就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面临的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相比,还很有限,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正面临着三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第三,从不发达、不完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比较发达、比较完善和合格的社会主义转变。在体制转轨、发展转型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既是旷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处于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理应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文章和经济著作空前繁荣。数一数当前我国出版的书籍和报刊的种类和数量,无疑首推经济领域。需求引起供给,这是正常现象、好现象。但其中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等缺乏价值的作品。

出版社的过度竞争和不正之风,著作人的目标短期化,是形成这类局面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体现在数量方面,更要体现在质量方面。一篇优秀文章,一部高质量的精品,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远胜几十篇、几十部甚至几百部平庸之作。精品力作才是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志。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出版社拟以相对集中且有规模优势的学术群体为依托,欢迎国内外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的参与和赐稿,组织好时代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强的选题,出版融专业性、学术性和前沿性于一体的《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专业性指丛书是涵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及其二级学科为范围;学术性表现为资料和观点的引用应准确可靠并注明出处,研究工具和方法科学先进,实证分析基础上引出规范,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前沿性应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属该学科中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学术界还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尚未研究过的,或者能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和资料进行论证并提出新观点、新结论的,总之前沿性要求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为保证丛书预定的目标,出版社将采用国际通行的出版机制,对每部书稿实行两名以上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严格把关,杜绝伪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研究工作的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难免带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反映,值得我们借鉴。借鉴并不等于照搬,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中引出合乎实际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运用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分析工具和方法,以符合国际规范,是必要的。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或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著,都应该结合实际重新学习和再认识,实事求是地总结和传承借鉴,其根本目的

则在于发展和创造。

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加快改革开放,推进建设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合格社会主义。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创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框框,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开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展现出经济学发展的无限广阔前景。这里,既需要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样需要各具体经济领域应用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它们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大厦。

经济学优秀成果的产生,要经历一个艰辛的学习、思考、探索、研究过程。希望这套《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的每一本,都能以真诚的态度,解放的思想,求实的作风,开拓的精神,从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中提出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在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

伍柏麟

1996年国庆

于复旦大学

序

高汝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转变始终是经济学家、政府和企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年有余,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世界瞩目。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顺利推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换,这样的问题甚至比高速增长时期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实践来说,是滞后的,这一点在产业结构理论分支中也同样有所体现。本书是郁义鸿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本专著。本书试图在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元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若干设想。作为其博士生导师,我向读者郑重地推荐这本专著。

本书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进行讨论,将一系列的有关概念加以严格的阐释;本书又从最为简化的情况出发展开整个的分析,并逐步放宽各项假定,分析各项假定放宽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变规律的变化。这一基本的分析思路显示了其理论架构的严谨性。

学术专著仅有严谨是不够的,还要有所创新。本书获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最重要的是,作者提出建立产业结构转变理论体系的任务,并提出一种理论框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作者的创新是建立在对现有文献和成果的全面述评基础上的。作者指出,尽管产业结构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有许多还出自名家之手,但在对大量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之后,作者发现,在产业结构理论与基本事实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但确实抓住了目前在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缺陷。事实上,现有的理论或是对现象缺乏系统完整的阐释,或者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则大多囿于二元结构理论。但二元结构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对整个经济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不仅过于简单,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差距甚大,而且使得由此作出的理论分析无法把握产业结构转变的全过程。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长期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动态变化要求我们的研究也应能覆盖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种全过程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只有对这种全过程进行分析,才使我们有可能研究这些环节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等相互之间的影响。这是郁义鸿这本专著的一大长处。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基于对各种理论比较,作者最终将其理论建立在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追求理论模型的数理化倾向,追求模型形式的完美,但从本质上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越马克思再生产原理。

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的高度抽象性,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转变来说,就很难直接加以运用,从而须将这些基本的、高度抽象的原理具体化。从这一意义上说,郁义鸿的这本专著就是将马克思理论具体化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作者在这种理论框架的建立中,在许多步骤和环节中都体现了科学性、严谨性和创新性的较好结合。

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分析来说,部门划分是所有分析的前提。作者按要素密集类型、规模经济性和劳动力素质等部门经济特性对整个经济进行部门划分,既符合理论模型简洁性的要求,又能够较充分地体现现实性与应用性的要求,以便于从理论模型中引出重要的政策涵义。这种部门划分为其后续的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理论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在消费结构转变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假说,并由此作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划分。进一步,作者还将消费结构的转变与收入分配结构联系起来,提出了“收入分配的需求结构效应”这一新的概念。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消费结构转变的规律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技术进步分析中,作者提出了“技术进步结构”这一新的概念。技术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因此在技术进步政策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就业因素,必须针对不同的产业采取不同的政策,而“技术进步结构”的概念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大有帮助的。

在剩余劳动力问题分析中,作者阐明了隐蔽性失业等基本概念,将剩余劳动力与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对于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分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在对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作了分析之后,研究了产业结构政策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进入了新的“过剩”时期之后,如何选择有效的产业结构政策来推进结构转变,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对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政策所提出的建议,值得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诚然,如作者所言,建立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

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此,需要中国的经济学界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本书在这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或许是一条可以取得很大成效的路。这条路的进一步开拓还要花大力气,理论模型还可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对于中国经济的经验验证还需作得更为细致深入,这样,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也就能够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前 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具有发展中经济的几乎所有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就可以照搬过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就有了现成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其他的西方经济学分支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有用之处也就在于借鉴,而决不是照搬。从马克思最基本的“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论出发,所有科学的“抽象”首先都应建立在所研究对象的“具体”之上。因此,尽管拉尔等人作出发展经济学陷于“贫困”甚至面临“死亡”的判断,但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又与发达国家有着某些本质上的差别,发展经济学就有其生命力。这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归纳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对这一基本特征,笔者用“多重多元结构转变”的概念来加以概括。经济结构的转变是发展中经济不同于发达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结构转变更具有多重多元的特性。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不仅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消费结构转变、收入分配结构转变与技术进步结构转变等,而且包括与城市化进程相联系的城乡结构转变、由中国地域广阔的国情所导致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变,以及与中国处于改革进程之中这一特征相联系的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同时,每一重的结构都是一种多元结构。在这种多重多元结构转变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构造起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基本框架。

笔者提出了上述概念,并提出了以多元产业结构的转变为核心的基本研究思路。但本书仅以多元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对象。首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在所有各重结构中占有核心地位。笔者认为,多重多元结构转变的分析须从产业结构转变的分析开始,只有将产业结构转变的规律分析清楚之后,才能有效地分析其他各重结构的转变及其与产业结构转变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个理由是,现有的产业结构理论不能提供一个现成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倾力于建立一个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理论框架。

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但在发展中经济结构转变的领域中,理论与现实却存在着脱节现象。这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结论。笔者在第2章考察了各种有关结构转变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并对它们作了简要评价。对于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从克拉克到库兹涅茨,再到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等,大量经验研究的成果揭示了许多基本的规律性的现象。但问题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对这些现象给出系统完整的理论阐释。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或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就其内在的理论结构来说,也很难处理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的发展中经济的问题。正因为此,经济增长理论的多部门模型实际上并不能告诉我们比单部门模型多多少的东西。投入产出尽管被称为“经济学”,但除了其最基本的来自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架构,实际上其后来的发展都更具有方法论意味。帕西内蒂的“结构动态经济学”以建立结构变动理论为己任,但遗憾的是,如他自己所说,其理论主要适用于发达经济。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结构理论是以发展中经济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但一方面,该理论主要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难以解释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转变;另一方面,仅仅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或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这样的二元结构不足以剖析结构转变的复杂过程,也不足以阐明结构转变的许多重要特征,更不足以从中得到更

有现实意义的政策含义。

琼斯对经济增长理论中两部门模型的最终评价是,“两部门模型的分析现在正经历着报酬递减的考验,因为比较复杂的模型只是从边际方面给从简单的模型中获得的见解增添内容;而许多最重要的课程当然已包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发表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之中了”[80](p. 150)。这就将我们引向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显然,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持续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毫无疑问,马克思再生产原理是对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规律的最深刻的揭示,因此,这些原理应是我们进行产业结构分析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以产业结构转变为研究对象的,也不是以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其高度的抽象也给其原理的具体运用带来困难。因此,我们须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具体化,以适应我们的研究目的。

第3章,笔者以马克思再生产原理为基础,建立起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分析多元产业结构转变,就需要多部门的理论模型,因而部门划分是模型建立的基础。遵照一定的原则,我们在简化的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将整个经济划分为六个部门,并突出强调各个部门不同的经济特性。部门经济特性主要包括要素密集类型、规模经济性和劳动力素质要求等几个方面,它们对于多元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产业结构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之一是各个部门的剩余之间的交换必须满足物质补偿与价值补偿关系。笔者以部门剩余的交换为基本线索,分析了在多元部门划分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在静态均衡状态中的部门剩余交换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并用比较静态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部门剩余交换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此外,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对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产业结构转变的动态分析也必须覆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总过程的所有环节。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动涉及所有这些环节,形成一种

机制。这种结构转变的机制并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变动沿着一条最优路径去发展,相反,它令产业结构的变动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几乎无穷多的可能路径。现实路径的形成最终依赖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经济制度。我们简要分析了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产业结构转变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从第4章到第7章分别对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各个主要环节和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基本思路是,首先在一系列较严格的基本假定之下来分析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基本趋势,然后逐步放宽各个假定,纳入各项主要影响因素,并分别分析这些因素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基本趋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4章着重分析消费结构的转变对于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导向作用,并分析收入分配结构对于需求结构的影响。笔者首先提出了消费结构转变的一种理论假说,并在这种假说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划分为贫困阶段、温饱阶段、小康阶段、中等富裕阶段和发达阶段等五个阶段。笔者还提出了“收入分配的需求结构效应”的概念,并分析了极端平均的收入分配和多阶层的收入分配将对需求结构产生的不同效应。

第5章分析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首先,在不存在技术进步、充分就业和封闭经济等假定条件下,笔者分析了多元产业结构转变将呈现出怎样的基本趋势。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发生转变时,产业结构随之发生的转变与大量经验研究所归结的趋势是一致的。这是在本书建立的基本分析框架中所给出的关于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一种理论阐释。对于技术进步,笔者在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要素生产率 and 要素使用比例的角度出发,给出了技术进步和中性、非中性技术进步的有关概念。在分析了部门经济特性与技术进步特性之间的联系之后,笔者还提出了技术进步结构的概念。这样,在纳入了技术进步因素之后,再来分析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就可以

判断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转变具有怎样的影响。

剩余劳动力与隐蔽性失业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第6章专门讨论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隐蔽性失业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笔者首先讨论了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的概念,进而依次分析了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对收入分配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然后综合分析了其对于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第7章讨论了在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转变问题。与封闭经济相比,开放经济中影响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关键因素是部门产品的可贸易性与比较竞争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这两个因素对于多元产业结构转变的分析来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最后,在上述各章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第8章研究了产业结构政策的选择问题。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消除产业结构的失衡,因此笔者首先讨论了有关的概念,并分析了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状态,包括静态失衡与动态失衡两种可能。针对产业结构的失衡状态,产业结构政策可能选择的手段主要包括相对价格调整、技术进步结构的调整、收入再分配、就业结构政策和税收优惠等几个方面。对于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实施来说,各种手段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以上各章中,笔者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粗略的经验分析。在这些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在对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转变的现实矛盾作出判断之后,笔者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基本指向提出了若干设想。这些设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推进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从重工业着手消除隐蔽性失业;启动房地产市场,以建筑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转变;推进技术进步结构合理化,增加就业机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创造就业机会;强化再分配政策,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政策都可能